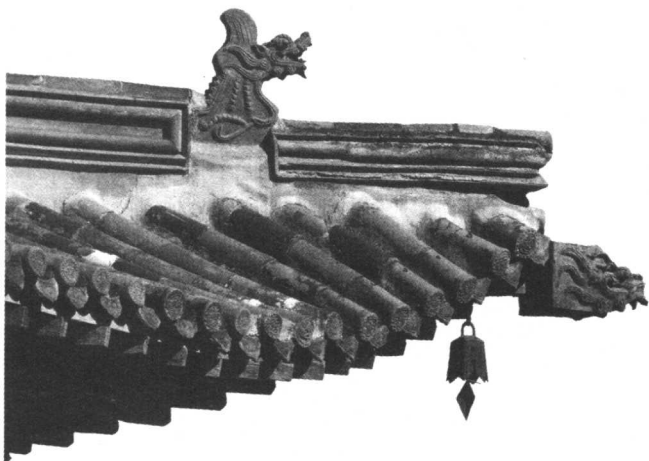


社会史视角下的
近代湖湘文化

彭先国 著

岳麓书社



社会史视角下的 近代湖湘文化

彭先国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彭先国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ISBN 7-80665-840-8

I. 社... II. 彭... III. 文化史—研究—湖南省
—近代 IV. 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053 号

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

作 者: 彭先国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吴 茵

封面设计: 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 千字

ISBN 7-80665-840-8/G · 547

定价: 18.00 元

承印: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高新技术开发区 M1—3

邮编: 410013

电话: 0731—891194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本书得到 2004——2006 年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编号:04A060)
与
湘潭大学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助

目 录

001	序 论	社会史视角中的近代湖湘文化
005	第一章	移民与近代湖南士风
016	第二章	晚清湖南士风研究
030	第三章	明清两朝湖南士子仕途分析
042	第四章	试论近代湖南士风的历史传衍
054	第五章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064	第六章	清代湖南人口流向研究
082	第七章	湖南近代水灾研究
098	第八章	北方秘密宗教与湖南斋教
114	第九章	从流民的社会处境看 湖南天地会起源
125	第十章	19 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研究
138	第十一章	曾国藩与会党
156	第十二章	19 世纪中后期湖南会党 在长江流域的活动

170	第十三章	会党与晚清湖南时局
187	第十四章	民国湖南会党散论
205	第十五章	近代湖湘人物对土匪的处置心态 与行为研究
227	后	记

序论 社会史视角中的近代湖湘文化

每一个学科的研究,有两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是对象,一是方法。对象总是处于恒定不变的状态,而方法论的不同,则常常支配着研究对象的面貌。这就说明,方法论对一门学科的影响是多么重要。近年来,史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正在向深度与广度发展。学者们使用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来研究史学对象,从而使我们认识对象更加生动与符合历史实际。“各门社会科学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1]

但是,在对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中,这一情况似乎没有发生。

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2]“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3]文化是人类的专利产品,包括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实物与非实物的,文字与非文字的。这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这种文化可以承袭、可以变异、可以互相影响,但决不

能被分割。而我们之所以把它分割,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是因为我们受认识水平与方法论的局限。总之,受制的因素很多,所以我们才对文化的认识有层次之分、区域之分、阶段之分、主次之分、轻重之分、物质与非物质之分等等。当然,湖湘文化也不例外。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考古材料表明,大约1万年前,湖南地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原始采集与渔猎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古老的农业文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的农业与家畜饲养业有了发展。商周时期,湖南步入青铜器时代,但由于地理与民族的影响,形成了西周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秦汉以后,湖南一直是中国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对湖南的文化影响极为深厚,但境内楚文化也相当繁荣。如湖南是道家学说的发祥地。唐代道观、佛寺林立,柳宗元在永州提倡“统合儒释”。北宋周敦颐合儒、道、佛于一流,开宋明理学先河。南宋时,湖湘学派形成。明末清初王夫之集经学、哲学、文学之大成等等。总之,洞见湖南一地,文化源远流长、卓然独立。

近代湖湘文化更是满天灿烂。钱基博先生论赞曰:“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4]目下,对它的研究更是到了相当火热的地步。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向上看”,是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史”。政治史是一种叙述性历史,又是一种事件性历史,但历史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表面现象往往掩盖了在幕后进行的真实的历史运动,以及促使这种历史运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背景。政治史研究的是大人物、大背景。但是,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是综合的社会因

素。历史是结构的历史、是整体的历史。虽然我们不反对给历史人物以科学的准确定位,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往往只是海洋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换言之,近代湖湘文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研究文化必须采用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因为社会史是“往下看”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永远是社会,包括它的结构人口、民族、社会阶层、职业、婚姻、家庭等等。而这些才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政治史只说明王朝与政府的更替,不能弄清生活的奥秘。并不起眼的民间社会和社会生活往往蕴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因而研究文化与政治必须研究社会,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常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考察一种文化,同样必须同时考察这个文化所处的那个社会,把它看成一个有结构、功能、自我延续、自我反应能力的体系。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认识文化。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史的视角去认识社会,去认识湖湘文化。这就是本书的要旨。

这本文集,实际上是我对湖湘文化的一点心得,主要从会党与士人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以为,对近代湖湘文化的任何一点挖掘,都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丰富与补充,因而也是十分必需与必要的。在“向上看”与“向下看”的两种研究方法中,“向上看”无疑是一条通往正统的阳光大道。但是,也只有把这种“向上看”放回社会的环境里,这种“向上看”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我们也才会更加接近这个文化与历史的真实面貌。

注释:

[1](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转引自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钱穆《文化与生活》,载《中华文化之特质》,台湾世界书局1969年版。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章 移民与近代湖南士风

(一)

“中华民族到了 19 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1],湖湘大地也从 19 世纪起,出现了一批又一批驰骋宇内的济时经世人物,择其要者有:陶澍、魏源、汤鹏、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刘揆一、章士钊、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易白沙、彭德怀等。细阅近代历史,满眼尽是湖湘人物。例如,在哲学上,魏源、谭嗣同、毛泽东是不同时期的文化巨子;军事学上,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的军事实践与理论大大丰富了我国军事斗争艺术的宝库;学术研究上,魏源、李剑农、蒋廷黻、吕振羽、翦伯赞的史学,何绍基、王闿运、魏源、陈天华、陈衡哲、向恺然的文学,谭嗣同、章士钊的散文与政论,皮锡瑞、王先谦的传统经学等等,早已为世人举目共睹。所以,无数的史家,在点评中国近代史时,总喜欢引用“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来评价这批人物对近代与后世历史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些人,也无不透出心忧天下,经世济时的崭新湖南士风。例如魏

源,他以开创性视野,率先表达了湖湘士人心忧天下,敢于师事于外的气魄与胆略;曾国藩,他以毫不惧怯,迎难而上的精神,凝聚了湖湘士人敢于匡救时艰,善于应对危局的勇气与能力;毛泽东,他以对中国问题的透彻了解与把握,展示了湖南士人不僵守教条,创造性解决中国问题的卓尔不凡的才华;齐白石,他以晚年终成大师之举,展示了湖南士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奋进精神;谭嗣同,他以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姿态,展示了湖南士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铮铮傲骨。总之,与那些视道德为赘物,为利禄丧气节的“士人”相比,他们是中国士人的真正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什么是近代湖湘士风呢?就是超前思维、心忧天下;就是迎难而上、开拓奋进;就是锲而不舍、无所畏惧。

任何一种新的文化,新的士人风气的形成研究如果仅“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站在它的背后——新文化与新士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因此,我们讨论士风问题还必须从湖湘文化与人口的交织演变说起。

国内著名学者葛剑雄认为,在中国,绝对没有移民或流动人口的地区是极少的,所以要认识各地的社会现象,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宗族活动、社会群体、秘密会社等,都应从人口流动的历史来考察其源流,才能有全面的认识。作者认为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与理解近代湖南士风也应从这里开始。

(二)

湖南自古为“三苗”之国,但自宋代以后,湖南人口的血缘、族源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换。时代不同了,移民与文化士风也为之转变,“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两者的转变发生于同一时期,看来决非历史的巧合。一定的文化现象总是从相应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当时,两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是:湖南的人口与士风文化均不约而同地产生了重大变化,并且自此以后湖湘文化便独自走上了一条个性鲜明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诸多疑惑,只能是放在宋代以后湖南社会(特别是人口流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去解释。因为从此以后,湖湘士人们在主体上传承的并不是荆楚“三苗”文化,而是汉儒文化,但是,在传承汉儒文化的框架之内,湖湘文化又有别于长江文化中其他地方的板块文化。就是说,当北轻南重的宋代文化在江浙地区成为主导文化之时,灿烂于近代的湖湘文化在此时正处于一个浸育时期。胡安国、朱熹、张栻等来湘兴院讲道,江浙学者避地湖南,传道布学,教授生徒,湖南强烈地感受到东来文化的辐射,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圈。胡安国、胡宏从福建转徙衡山,唐渊南寓巴陵,湖湘之学,近代士人之士风自此开始有了它的历史源头。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湖湘学派的形成,是移民传播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诸如胡安国、朱熹、张栻等,都是从外省移徙入湘的士人,从人口的流入流出看,他们与一般的移民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什么这些外省士人入湘一旦布道授徒,就立刻能在湖南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圈呢?如前所说,其中的奥

秘只可能从人口结构产生大变化后形成的新的文化背景中解释。(当然,这绝不是说,在两宋以前,湖南就没有受到汉儒文化的辐射,像罗宏、蔡伦、祝良、胡腾、张晋、刘优等,都是在儒家文化在湘初入之时,学有所成,立名于后的士人,但是,他们并不能在当时当地布道授徒,形成一个数量可观的门徒业徒群,取得广泛的学术影响。因此,与两宋以后随着理学之兴而形成的湖南新文化圈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两宋“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庆历之初,学统四起”。他们各称孔孟。人人知为稷契,各自论说,不相统摄,谋求定为一尊,一时间儒学的天空星座并立,争追日月,从而使儒学形成了地域的多元化。这种学派的并立,一方面使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超地域一统,为学者们改革儒学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人口与文化重心的南迁,各地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各种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必然的联系。

湖南在此时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关于湖南的人口,谭其骧、葛剑雄、姜涛等著名人口史专家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作者也曾就明清以来的湖南人口做过专题探讨,专家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湖南人口结构以两宋为分水岭,宋以前多为“苗人”、“蛮人”,宋以后多为汉人。宋代,汉人多从北方迁移入湘,明清时期又多从东方入楚,几尽江西人。从明清以来的族谱、家谱,以及各种地方志反馈的史料看,湖南人口的流入分布都印证了专家们的这种分析与判断。

谭其骧先生在所著《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中考出湖南明清两朝的移民,三分之二来自江西,湖南北部多南昌府

人,南部多吉安府人。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研究统计,1578年(明万历六年),湖南人口为1,917,162人;1746年,人口为8,672,433人。在此170多年间,湖南人口猛增,约八十年增加一倍的人口。这种人口增长,除了人口生产的因素之外,人口的移出移入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在永绥厅,“土户寥寥数十家,其余居民自内地迁入者,家计淡泊者多历数十年,来或买土开垦,或贸易经营,渐觉充裕”。龙山县“巨族客籍为多,服食言动皆沿风华,至伏腊婚祭一切习尚或各守其祖籍之旧,往往大同小异”。^[3]根据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统计,该县有原始祖户617户,其中两晋以前的老籍户6户,不到总数的1%,明代迁入303户,占49%,清代迁入188户,占30.4%。从人口迁入的原居地看,由江西迁入335户,占总数的54.3%,广东迁入71户,占12%,福建迁入34户,占6.6%,省内迁入20户,约占11%。其余15%,分别从鄂、皖、苏、浙、豫、川、晋、滇等移入。醴陵与湖南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实际上是一个移民县,湖南是一个移民省。

湖湘士人的先祖也是在这以后陆续移籍于三湘四水的。例如,王夫之,祖籍扬州高邮,明永乐初年先祖官司衡州,遂在衡阳安居。皮锡瑞,祖籍江西,后迁籍长沙。谭嗣同,祖籍福建清流,明迁至湘,先居长沙,后移浏阳。贺长岭,祖籍浙江镇海,后迁至长沙。黄兴,祖籍河南光州,先世避乱先迁江夏,东汉以后居转洞庭,明始由南昌定居长沙。

移民文化与士风的性质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相联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移民文化的移迁与扩张,实际上可视为汉儒文化在空间范围的一个不断扩展过程。从某种程序

上讲,也是士人士风的移变过程。移民把汉儒文化“搬迁”到某地,通过与当地文化的杂糅而得以生根发展。

这种文化错杂的深度与广度又总是与移民文化在文化结构中的比例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与当地封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程度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在人口结构比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也就是汉儒文化在某地文化结构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当然也是士人士风的移变过程。随着移民的迁入,湖南的文化与士风也经历着这种文化交融。

其一,两宋时期,湖南人口开始了结构性转变,三苗之地“王化”、“汉化”的速度突然加快了许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受北方战乱的影响,中原士民扶携南渡。湖南“户口之众,数倍前日”。

“郡邑乡村尽充实”。与此相适应,新式书院教育、学校教育在湖南也蓬勃兴起,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经世济时,具有高尚气节、士风的湘籍人才群体。据初步统计,这时期,湖南书院的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浙江,达 51 所,分布在近 30 个县内,岳麓、石鼓、碧泉、城南等书院闻名全国。

据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统计,宋代列有湘籍人士 390 余人,其中进士 179 人,他们要么是学术上有所成就,要么是县以上官吏,湖湘士人的政坛突进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不能代表士人的全部,更不是当时的士人精英。当时的士人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士人并没有醉心于科举之路,而是一如既往潜心学问,弘扬本地文化,遵循湖湘学派不汲汲于利禄的宗旨,潜心研究经世济时之学术,历史恰恰验证,正是这批人,才初步形成

了传承湖湘文化的中坚，他们身上所表现的那种不为利谋，不为名诱的士风气节，才真正体现了湖湘士风的独特品质。

其二，湖南人口真正结构性转换的是明、清两朝，与两宋不同，这一时期移入湖南的居民主要从东边而来，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湖南移民线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否孕育着湖湘文化与士人士风新的发展机遇呢？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并非寥寥数语就能分析透彻的。但要解释湖湘文化的传承，又不能不予以思考与研究。在作者看来，明清与两宋，湖南所处的文化背景在性质与内容上是一致的，汉廷南迁，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湖南原有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外部文化的强烈冲击，从而发生结构性衰变，在学统四起的两宋，湖湘学独步学林，湘人士风渐显魅力。明清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桎梏时代，全国士风因此也走向堕落。在明代，有些知识分子为俸禄生活，屈从皇权，开始丢失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独立。士无特操，随风而倒，许多士人积极地从事经商活动，大量的士人，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士人从埋首穷经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无比现实的商品经济生活。到了清代，士人操守更加沦丧，有些人没有了独立的人格与凛然的正气，甚至以能做皇帝的“奴才”为荣。被皇权驯化、奴化，士人沉醉于物欲享受和纵欲上，穷烹饪、狎优伶、谈古董，凸现着士风的颓废与萎靡。训诂与考据变成了士人们游离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消遣方式。士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堕落呢？

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晚期，皇权把文化的屠刀砍向了